

章太炎的「瘋」與「變」

董 霖

清末民初稱得上孤鯁、狂傲的學人，首數浙西餘杭章太炎。章太炎初名學乘，字枚叔，後更名炳麟，太炎是他的字，他不但是當時的特立獨行之士，更是一個敢「惡言忤當道，直語謝師門」的絕人；而於學術思想上的變易，亦為他人所不能及。甚至連他的門生弟子們，在他故後不久，就相互的辯論起師門治學的異同來，真是先後映輝的一段佳話。

太炎生於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逝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在他六十七個寒暑的生命歷程中，身經無數次政治上的大變動，於學術思想的領域裏，又正遭逢到西方科學、民主的衝擊；以一個沉浮國故，尊儒崇孔，在考據上獲得有成的學者言，竟能於極短的兩三年間，轉而接受了維新思潮，並且積極地參與此一運動，的確顯露出他異於常人，及其不同凡響之處。只不過因他的看法和所採取的手段，與康有為等的保皇一派分歧，却又從改良主義的圈子中跳了出來，則尤屬難能可貴了。

關於太炎在國學上的成就與地位，早經蓋棺論定，勿庸多贅，此文僅就他的「瘋」、「變」兩點落筆，或對他的真性情，能有較清晰的認識。

蘇報案北京囚抒感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六月間，太炎因蘇報案在上海被捕，與鄒容先烈同被關入西牢，曾寫「癸卯獄中自紀」有言：「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於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何不出圖，惟余以不任宅其位，繫素王素臣之迹是踐，豈直抱殘守闕而已。又將官其財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遂，鑒於仇國，惟金火相革歟。則猶有繼述者，至於支那闕頌壯美之學，而遂斬其流緒，國故民紀，拒於余手，是則余之罪也！」迨至民國五年被袁世凱羈禁北京時，又曾在家書中寫道：「研精學術，忝為人師，中間遭離禍亂，辛苦已至矣。不死於清廷購捕之時，而死於民國告成之後，又何言哉！吾死之後，中夏文化亦亡矣！」

對神經病一段解釋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出獄後東渡日本，在留學界及民黨的歡迎會上演說，有云：「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

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多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已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傳說某某是神經病，某某也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當面前的時候，那種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

太炎自量其神經如此，亦即章瘋子的由來。若就其流於偏執的特強性格，及時時譏訶顯要者諸端觀之，在當時不能同於流俗的人，自然會被一般人目為瘋癲的；尤其是倡言革命者，被清廷目為叛逆，隨時都可惹上殺身之禍，對那批「提着腦袋喊革命」的人，不視為瘋子是什麼？

罵袁世凱論袁世凱

民初太炎被袁世凱困留北京時，嘗於憤恨之餘，手書「袁世凱」三字遍於几案之上，日必擊拊至再三再四，藉洩胸中之氣。在憔悴抑鬱中，作「終制」之文中，又每以劉基自況，並託杜志遠代為謀一葬地，書中有言：「劉公伯溫，為中國元勳，平生久慕，欲速營葬地，與劉公家墓相連，以申九原之慕，亦猶能蒼水從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長其鄉，願為我求一地！不論風水，但願地稍高敞，近於劉氏之兆而已。」其嚮往之殷！自許之切，皆溢於言詞之外。民國五年五月袁世凱

死，始獲釋南返。後在論及袁之種種時，曾謂：「袁世凱亦自可人，當余戟手痛罵時，乃熟視若無觀。近人閒有後言，輒惡之欲其死，熟敢面短之，況痛罵耶？」由此亦可見一代巨擘，其人異於常人者，實乃「唾面自乾」之能手也。

當太炎被羈留期間，曾寫了一封上袁世凱書，文中極盡詆譭笑罵之能事，並且及於「考文苑」一事，亦為其之志也，頗值一讀，茲並錄於后：

「前上一書，未見答覆。邇者憲兵雖解，據副司令陸建章言，公以人才缺乏，必欲強留，炳麟不能受此等言也。若有他故能議公者，豈惟一人？輿論縱不振於中土，若外人之煩言何？炳麟本以共和黨獨立來相輔助，亦微至而相行耳。而大總統之不捨，既使趙秉鈞，以國史相餌，又欲別為置頓。炳麟以深山大澤之夫，天性不能為人門客，游於孫公者舊交也，游於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寧能與鷄鳴狗盜從事耶！史館之職，蓋以直筆繩人，既為羣偏所不便，方會上無姦雄，下無大倖，都邑之內，攘攘者穿窬摸合皆是也，縱作史官，亦倡優之數耳！竊聞史遷陳壽之能謗議，而後嗣樂於覽觀者，以述漢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雖以歐陽公之嘆息，欲何觀焉？今大總統神聖文武，咸五登三，簪筆而頌功德者，蓋以千億，亦安賴於一人乎？屬有武漢之士，招往講學，北方亦有一、二人簪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氣光融，當江漢合流之地，不欲羈滯幽燕也。必欲蔑棄約法，制人遷居，知大總統恪共憲典，必不為

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與朋輩優游浪蕩。炳麟亦不能為也。苟圖其大，得屈其身以就晦冥之地，則私心所祈禱者。獨考文苑一事，經緯國常，著書傳世，其職在民而不在官，猶甚九兩師儒之業。邇者方言國音字典文例文學史、哲學史等，皆未編成，而教育部羣吏又言誓未有知識，國華日消，民不知本，實願有以極濟之。同苑須四十人（仿法國成法），書籍碑版印刷之費，數復不少，非歲得二十四萬元不就。若大總統不忘宗國，不欲國性與政治俱衰，炳麟雖狂簡，敢不從命？若繫一人以為功；委棄文化以為武，鳳翔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炳麟豈何愧之有？沒有不幸，投諸濁流，所甘心也。書此達意，請於三日內答覆。」其擇善固執之旨，將生死置諸腦後的胸懷，衡諸當世之人，熱能與之相提並論？其「瘋」其「狂」，自有其大節在。不若一般苟苟蠅蠅之徒，藉裝瘋賣傻冀邀譽寵之令人可恥也！

學術思想變遷之跡

有關太炎學術、思想變易之主要動力，應為中日甲午之戰清廷戰敗，與夫民族主義覺醒的意識抬頭，從而促使他由尊孔轉向崇法，同時也走上政治改革之理想。戊戌變法期間，他寫過「商鞅」一文，明確表示了他與康、梁的觀念及做法上的分歧。迨至戊戌變法失敗，緊接著因義和團所引起的八國聯軍之役，以及爾後清廷在外交上處處受到蘇俄的明偷暗搶，國勢愈形可憂。此時太炎毅然剪掉辮子，直接投身政治革命的行動中去，並強調法家思想之可足恃，而有抑孔的言

論出現；他在光緒二十八年重新修訂了他的「論書」內容，將法家的思想與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結合起來，作為政治改良的革新基礎。翌年又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大肆抨擊「保皇」的復辟謬論。進而更闡述了民主革命的時代已經來臨，倡言用武力進行政治改革，是必然手段。接下來又為鄭容手寫的「革命軍」作序，未幾蘇報案發，被捕關入西牢。

從上述一連串的動盪中，我們很容易瞭解到太炎的學術思想之變，出於愛國愛民之真感情。絕非為中共方面所宣稱，係受了無產階級馬列主義思想之影響，而從事民族革命鬥爭。

對黎元洪獨多推許

太炎一生傲岸，絕少對人謙讓，唯獨對黎元洪之稱道始終如一，曾於電文中有「炳麟數嘗侍公」之語，此「侍」字，豈止一字千鈞耶！於黎亡故後，輒以聯語，亦有「繼大明太祖而興」之句，把黎比成明太祖，又見其以劉基自況的心迹。他與湯國黎女士的婚姻，雖屬友人介紹，但說動他與續娶之念者，亦因黎元洪生前頻頻力勸之故。太炎晚年的性情，略見改善，能於所不善則不見，或見亦不願多言，更不復昔年之痛罵、謾罵了。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有：「少年氣盛，立說好異前人，由今觀之，多穿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數年，或可以無大過。」措詞篤實，心氣平和，大異於往昔，似已悟出「從心不踰」的真義來。章、湯結婚二十餘年，伉儷情篤，凡此性格上的轉變，實應歸功於湯國黎女士之婉言勸勉也。



(下圖右)大詩人楊雲史四十歲時的照相(文見十五頁)。
(上圖)清末民初孤鯁狂傲的學人，國學大師浙江餘杭章太炎遺照(文見三十二頁)。



民國二十三年以江蘇省政府主席兼任江寧縣政委員會委員長的地方自治先進陳果夫先生遺照。(參見三十四頁申慶璧地方自治史話)